

“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谋求更大话语权

核心提示

在全球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已成为国际舞台上表现抢眼的一支生力军。

3月底，“金砖国家”智库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了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的一份建议文件。文件指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使世界更加关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将有利于“金砖国家”增进共识、扩大合作，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的积极认知。

“关注”、“影响”和“积极认知”等字眼背后，反映出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诉求，让世界倾听新兴经济体声音的希冀。

发出同一个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国际形势黄皮书》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由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结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而新兴国家则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

世界格局出现可见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地位影响此消彼长。在这样的进程中，国际机制在发生变化，多边外交场合出现了日益响亮的新兴大国的声音。

2009年3月14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G20财长会议期间发表了首份联合公报，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发出了有史以来的“最强音”。

“金砖四国”在这份公报中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2011年1月前完成成员国认缴份额的重新审核，“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穷经济体，应该具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性”；世界银行改革应该在2010年春季会议前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任命应该通过公开公正的遴选程序。

随后的6月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峰会强调，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承诺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11国(E11)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加强，不过尽管新兴经济体相对发达国家实力逐步上升，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博鳌亚洲论坛本月6日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1年度报告》作出如此评论。

E11是指G20中包括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南非等11个“新兴经济体”。报告说，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八国集团的对话平台并未完全消失，其潜在政策协调能力不可小觑，而E11经济增长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且E11目前尚未建立统一有效的对话平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E11之间的政策对话与经济协调。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E11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合作，协调立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和话语权。同时，E11应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充分利用G20这一国际协调与对话平台，与发达国家携手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话语权优势，即使在G20这个舞台上，导演和主角也仍然是发达国家，而且从北约、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来看，发达国家的团结能力仍然很强。

他认为，“金砖国家”的合作是一个积极的动向，有助于改变国际力量对比，阻止国际话语权一边倒，但在目前西方占据着话语霸权的情况下，话语权的争夺将变得更加激烈，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提升还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专家、畅销新书《话语权》的作者张国庆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新兴经济体目前的处境很微妙，虽然实力处于上升阶段，但仍有一些值得担忧的问题，例如新兴经济体泡沫破裂的风险；出现沾沾自喜情绪，疏忽创新和话语权争夺这些着眼长远来的问题；以及在国际上能否协调行动等。

他同时指出，当前，新兴经济体团结协作，尽可能形成合力，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争取更多发言权就显得很有意义。

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张国庆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还不充分，因而容易在各种博弈中陷入被动和吃亏，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话语权不对称导致难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同时国家形象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问题。

“话语权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话语权的谋求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也是经过上百年的努力才获得今日的话语权。张国庆认为，影响话语权的主要因素，一是实力基础，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

二是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维护，应全面提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树立积极、清晰，在国际上具有公信力并受到欢迎的国家形象。

三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势媒体。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在诸多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们仍然依赖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即使在事关本国利益的问题上，我们的媒体也缺乏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给了那些希望妖魔化中国的人以可乘之机。

江涌认为，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其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小，直接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强弱，以及实力的有效使用。

不过他也指出，话语权大小与经济实力强弱密切相关，但是并非总是如影随形，有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实力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将有限力量进行合理整合与有效使用，提升话语权。

长期以来，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等概念与论述，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西方明显居于优势；但是，在诸如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反恐防扩、地缘政治等具体国际事务或问题上的话语权则因具体情况而异。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西方一度抛出“丹麦草案”，试图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但是很快遭到发展中国家一致而强烈的抵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使西方国家如愿以偿，西方话语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

在江涌看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要进一步提升话语权，首先要进一步提升硬实力，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西方话语权处于优势与强势，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本身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长期以来，西方将强大的硬实力通过一系列安排与布局，经由各类方式、多种渠道充分体现出来。

其次是具备长远眼光和世界眼光，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纵观历史，环视世界，国际强国及其话语权无不立足于自己的核心价值，彰显自己的个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独特魅力。

再者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并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长期以来，少数专家学者为西方代言，跨国资本悄然渗透到中国媒体，这些行为和现象必须引起各方的警惕和防范。

发达国家“幌子”

新兴经济体国家获得更大话语权并非发达国家所乐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一凡对记者表示，国际经济格局在改变，新兴经济体发展趋势比较健康，壮大力量，扩大合作将会是个大趋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现行体系和规则的牵制，进一步提升话语权仍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很多掣肘，尤其是对中国的排斥和防范会更大。

金融危机加速世界经济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主流社会开始艰难地接受这一事实，但他们仍不断抛出种种自我中心的西方逻辑：例如，关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说法；在气候变化等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以及对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资本的扼杀和封锁等。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问题专家张莱楠将西方以上的做法称为它们祭出的“三个幌子”。她认为，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转嫁，中国等国家应搞清原因，不被干扰；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带来环保成本加大，应警惕西方对新兴经济体出口设置绿色壁垒。

张莱楠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应该看到，“远水解不了近渴”，长期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体制导致当前出现“发达国家生病，发展中国家吃药”的情况，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短期内的话语权问题更为重要。

江涌认为，西方在增加对华接触与合作的同时，也在加快对华遏制与竞争的步伐。在商品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议题上，发起了对中国的“合围”，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方面，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发展中国家不能承担的大国责任。

这些做法充分暴露出西方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唯我独尊的思维标准，强权意识十足。“承担国际责任，不是要美国的肯定，而是

立自主发展，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纵观历史，环视世界，国际强国及其话语权无不立足于自己的核心价值，彰显自己的个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独特魅力。

再者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并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长期以来，少数专家学者为西方代言，跨国资本悄然渗透到中国媒体，这些行为和现象必须引起各方的警惕和防范。



4月13日，随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到中国海南省三亚出席“金砖峰会”的俄罗斯记者在风景如画的亚龙湾海滨拍摄外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于14日在这里举行。

追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江涌强调说。

丁一凡也对记者指出，在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上，西方国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但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考虑的是对整个世界的责任，是对非洲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是让穷国也发展起来。

受访专家的这一观点和“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与会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应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对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方式和途径。”智库论坛的专家这样建议说。

小资料：

“金砖国家”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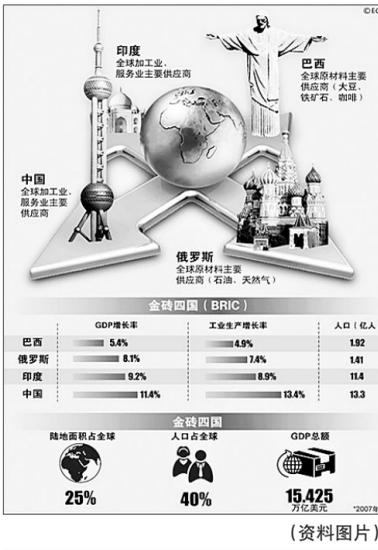
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首次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

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会后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就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阐述了看法和立场，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至此，“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会议在首尔举行，南非在此次会议上申请加入“金砖四国”。

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四国”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四国”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即将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据新华社



旅游业依赖门票经济是作茧自缚

12日，国家旅游局召开“中国旅游日”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务院已正式批复确定从今年起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国家旅游局表示，将倡议全国各主要景区在每年的5月19日推出免门票或打折优惠。(4月13日《京华时报》)

把5月19日定为旅游日，缘于徐霞客这个古人。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本土老乡，作为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他还是重要的旅游文化符号。徐基本上是个驴友，游历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有时还得自己背着行李赶路。靠着初劲儿，在交通不便的明代，他像侠客一样，饱览天下的好山好水，足迹遍及今16个省、市、自治区，写下了24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部游记被称为：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本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

今人视徐霞客为游圣，但谁要想步徐的后尘，游览他所游览的山山水水，不腰缠万贯，万贯，已断无可能。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徐游走祖国大地时，身上并没多少钱。而当下的门票经济，会令徐霞客当头棒喝，挡住他们匆匆的步伐。

5月19日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这一天作为旅游日，应当说是相当有文化内涵。而此时，大部分地区正值阳春和暮春，非常适宜旅游出行。但话说回来，即便5月19日全国各主要景区都推出免门票或打折优惠，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当下门票经济所带来的旅游发展上的困惑、困扰？

旅游业被称为朝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而一些地方的旅游业始终在门票经济里打转转，则使旅游业发展遭遇了瓶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此一路数，所秉持的正是门票经济的发展理念。但这样做是无法持续的，只能是欲求财路，而最终断绝财路。“山大王”思想，对旅游业发展十分有害。要知道，人文山水是祖先留下的遗产，是公共品，是为全民所共有、所共享的社会性资源，并不属于哪个人或哪个部门私有。门票过高，让人望而生畏，消费者也不是只能徒唤奈何，没有办法对付。最有效的办法是，人们用脚投票，趁热趁时开溜，让“山大王”宰不住自己。旅游产品又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消费者不掏钱买，不去使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最后受损的，只会是那些用门票经济作茧自缚的人。

据说，在许多国家，景区旅游都是免费的，没有门票这一说，就是收门票的地方，也是象征性地收钱。这样做非但不显得人性化，就是对旅游业的发展亦极为有利。想一想就能明白这道理：吃旅游业饭的人心态放平和了，消费者的心态自然就平和了。景区不收门票了，或门票少收了，就把人心和人留在了。细算一下账，不是这回事：挣门票只会挣到小钱，挣到一时之钱，把人心和人留下来，让他们多方位消费，才能多挣钱，长久地挣钱，并且是旅游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人都挣钱。只会怀疑劫道的事情，是行业内的耻辱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旅游业发展，需要业内之人眼界放宽一点，眼光放长远一点。那种不断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积极促进旅游消费的行为，才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不二法门。

今语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9 E-mail:peppy@163.com

“化妆猪”：售前抹粉 肉色变红

据重庆晚报报道，挑选猪肉时，往往是颜色鲜红的肉，看起来更新鲜，也就更好卖。前段时间来，重庆九龙坡区冶金3村农贸市场，有肉贩给猪肉涂抹一种可疑的白色粉末，抹过粉的肉看起来更新鲜，不知道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日前，重庆九龙坡区工商分局石坪桥工商所、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石坪桥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动，对该市场内一肉摊进行了查处，暂扣待售的可疑猪肉120多公斤，肉贩交出了那瓶白色粉末。

高铁适当“降速”才符合常识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铁路建设规模要适度超前，而不能过度超前。今后在具体项目安排上，要‘保在建、上必需、重配套’。”

除了铁路建设不再“过度超前”之外，盛光祖表示，现有高铁也会适当降速，并提供多种票价选择。“三种速度等级混合运行，多种票价和开行模式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高铁从无到有，仅仅花了5年不到时间，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达7531公里，高居世界第一，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这个成绩背后，还蕴涵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高昂的资产负债率会怎样影响高铁今后的运营？

2010年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铁道部2009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09年，铁道部每年还本付息的资金分别约为386亿元、418亿元和733亿元，同期税后铁路建设基金分别是533.5亿元、550亿元和549亿元。这意味着税后铁路建设基金已经

不足以应对还本付息支出。过多的负债，和高铁的高速发展，巨额投入显然不无关系，对于企业来说，如此高歌猛进的发展方式，似乎有悖经济运行规律的常识。高铁的“高速”，并不一定能带来相应“高速”的回报。

因为两个城市之间并不是只有铁路可以选择，同时还有公路。当乘客无法接受高铁票价的“高速”之时，他们就会用脚投票。有报道说，自去年沪杭高铁开通以来，原先已近消失的沪杭城际大巴又逐渐繁忙起来，原因很简单：高铁涨价了，对于那些不偏好时间而钟情于价格的乘客而言，舍铁路而求公路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沪杭之间发生，同样也在南京和上海之间上演。

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个铁道部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更快的速度，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客流。如何不再为这个问题纠结？除了铁路建设整体要“降速”之外，在目前的线路上应给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不仅要满足那些偏好时间的商务客人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那些更计较支出的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铁道部准备采取的“多种票价和开行模式”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调整。

此前高铁建设的高歌猛进，可以将其视为是中国铁路为摆脱落后局面而做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可以理解，发展高铁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之必由之路。因而，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建设高铁，只是要强调的是，单纯从技术上考虑铁路速度的快慢并不具有全部意义：即便是最快的列车，如果没有市场和乘客的认可，也容易陷入跑得越快亏得越多的困境。

期待铁道部门能从顾客需求这一最为基本的经济原理出发，以需求给高铁运行定价，而不是简单以内部的建设成本来决定运行的价格。这种定价还会对铁路建设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对其投入成本有着倒逼作用：铁道建设需要以其产出收入来衡量其投入。这也就是盛光祖所说的，铁路建设应“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满意为评判标准”。壹杨

误测生活就会误入幸福歧途

日前，广东省委领导致信省直机关干部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推荐阅读两本阐述幸福的书籍：《幸福的方法》和《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籍以进一步深化读书活动，并将学习思考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4月13日《南方日报》)

这两本书都是关于幸福的方法论，值得认真阅读并作出独立的思考。《幸福的方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每个人如何去获得幸福，《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从统计学的角度告诉人们如何在传统GDP之外，新建一个衡量社会发展标准系统，目标是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三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家，用理解社会的工具——经济学理论来解读幸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者是幸福个人的方法论，后者是幸福社会的方法论。

幸福不是人生幻梦，但却存在着需破解的密码。幸福是生命状态，是种感觉。对什么是幸福，人们的认识不一。

幸福是人类对社会、对生命的追求过程。正像《对我们生活的误测》这个书名一样，人们往往也会产生对生活意义和幸福目标的误测，把虚妄当成意义，把虚无看作幸福。无疑，幸福就在人们的身边，就在生存的现实中，就在人们所构建所确定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某种体系里。个体生命和社会时刻面临选择，追求幸福需要智慧的选择。有选择才会排除盲目性，才能有效规避路上的障碍。幸福不幸福需要追问，譬如，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靠指标？GDP是个好东西，但GDP被某种本意的反向力量所左右，就会变成坏东西。就像有人警告的，GDP不能用来衡量经济健康与否，因为它范围狭窄，许多复杂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对政绩的狂热追求，最易使之变形，变成不可捉摸之物，变成对经济健康发展不利的毒素。一个地区拥有发展所需的丰富资源是种福分，但因而为追求GDP付出极大的环境代价，并放缓、放弃其他社会发展目标，不但会扭曲幸福的价值，而且这种追求自身还会异化为发展的反面，成为一种魔咒。发展的意义在于使孩子有学上，居者有其居，得病有钱治，老有所养，人们能得到充分就业；发展的意义在于人们生活得更更有尊严，广泛的权利和各项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如果经济社会发展脱离了这些东西，所谓的发展就不是什么好的发展。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这本书，倡导把重点从“面向生产”的衡量系统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世代幸福的衡量系统，即转向更广泛地衡量社会进步，显示了此书在阅读上的重要性。有社会的不断进步，才会有民众日益增长的幸福。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会有曲折，社会终究会走向进步，幸福终究会不停地成长。幸福是人们内心的事情，需要重视过程也重视结果。增强幸福和促进社会进步，不靠别的什么，要靠人们的用心把握，要靠人们细小的和巨大的努力。伊文